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10年 总第9期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编

要 目

- | | |
|-------|-----------------------|
| 月度圆桌 |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座谈会 |
| 国际问题 | 郭生祥:对于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 |
| | 丁 果:中国面对人民币的公关危机 |
| 深化改革 | 黄 靖:中国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
| 经济转型 | 黄亚生:经济结构的恶化比GDP增长更需重视 |
| 人才竞争 | 王辉耀:中国需谋万世与全局的人才战略 |
| 科研改革 | 曾左韬: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的建议 |
| | 孙贤和:如何在中国建立类海外的学术环境 |
| 企业走出去 | 陶庆华:跨国企业“当地化”的一些建议 |
| 港澳台研究 | 丁学良:香港年轻人贫困化的问题 |
-
-

www.ccg.org.cn

电话:010—64392122、64392123、64398745 传真:010—64398744 邮箱: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为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裴敏欣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陶庆华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旭东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邀专家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曙明 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郭生祥 澳大利亚澳华金融专家协会理事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胡元豹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执行长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磊 日本法政大学工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罗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战略与国际商务讲座教授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彭维刚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数学教授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史天健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学院教授
隋殿志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理校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唐永春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中心主任
王坚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传播学院教授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王晓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玫瑰石顾问公司独立经济学家。
谢宇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晔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力奋 FT中文网总编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美国百人会会员
赵红心 美国圣路易大学财经教授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执行主编
邓宗南
编辑
苗绿 常慧敏 封涛 林婷
编务
王颖 伏平平 孙娜娜 曹小慧

◆ 月度圆桌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座谈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跨国企业已由外来经济因素演变成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带来了新的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商业文化以及现代管理制度,还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进行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外来跨国企业如何在中国继续发挥应有作用,如何更好地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与共赢式竞争?本土跨国企业又如何更为“国际化”?如何“走出去”在全球发展,如何成为真正的国际大公司?

为了探讨这些对于中国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话题,2010年3月28日,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邀请了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办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的建言献策月度圆桌。会议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主持。

其他出席人员包括: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原财经委主任傅志寰,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陶庆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兆熙,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命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处长赵健,商务部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王开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中国中化集团投资部副总经理李雷,法国必维国际集团中国公共事务副总裁马晓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罗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诺华制药中国区总裁易珉,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RIM大中华区总经理刘征宇,伟达公关公司高级副总裁孙玉红,阿尔斯通能源管理中国区总经理王春岩,巴克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阎飞,中央统战部六局干部袁争(排名不分先后)等。

与会专家总结表示,跨国公司对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跨国公司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和商业文明以及现代管理制度,同时,还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从单一走向多元以及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华外资跨国企业对中国的

开放态度产生了一些疑虑，国际媒体也有不少负面的报道，这需要引起我有关方面的重视。与会专家建议：

一、中国应继续重视跨国企业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跨国公司就帮助过中国进行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和说服工作。另外，未来三十年，我国进行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发展低碳经济，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与理念的跨国企业依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还应继续重视跨国企业的作用。

二、改善相关政策、市场环境，政府文件等应谨慎使用“利用外资”等措辞。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来到我国发展，主要因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确立市场经济、改善了相关政策、市场环境。目前，我国硬件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急需加强的是公共政策、市场环境等软建设，包括完善涉外经贸方面的法律体系，改善外来跨国企业的舆论环境等。因此，我国应注意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引导与构建中国全新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行为规范、交易准则、国际商务基本规范等。政府部门的文件应注意不再使用“利用外资”等措辞，更强调“共赢”、“和谐”等。

三、舆论引导上提倡把跨国企业中国公司当作本土企业，同时鼓励跨国企业加强在中国的社会责任感。有些媒体认为跨国企业就是为公司总部或注册地所在的国家获取利益，而忽略了其“全球性”特点，进而把跨国公司在与中国的发展与本土企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忽略了他们之间合作以及共赢式竞争的内容。事实上，跨国企业来到中国，同样向政府纳税，同样提供就业，同样提供产品与服务，同样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从某种程度上看与本土私营企业没有区别。如果我们舆论上强调区别对待外来跨国企业，那么，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遭到“歧视性待遇”，我们也同样难以进行合理性的辩护。同时，我们在把跨国企业中国公司当作本土企业看待的同时，也鼓励跨国企业要以“本土”的姿态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处理环保、节能减排以及劳工保障等问题。

四、充分发挥跨国企业的作用，帮助我国的国际交往与塑造国家形象。在过去三十年，随着跨国公司的“请进来”和本土公司的“走出去”，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逐步加大。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经济开始崛

起，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有时也趋于紧张，包括人民币汇率等和双边贸易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来改善中国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往来的相互理解。另外一方面，外来跨国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之后，也会主动在海外实际上帮助中国形成良好的国际形象，避免当地国对中国不必要的误解以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五、鼓励跨国公司为改善我国商业文化、市场环境等方面做出贡献。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虽然人们对于某些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提出了质疑，但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多数跨国企业尤其是真正国际化的跨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自身行业内成为全球领先的公司，在技术、理念、文化、品牌、管理、经营以及创新创意等方面，必有某些全球领先之处。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发展，与本土企业进行的竞争与合作，他们的商业模式、价值文化、管理理念、行为准则等，也为我国商业文化、市场环境以及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经验参考，有助于改善中国软、硬环境，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体系当中。

六、发挥跨国公司作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与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技术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整体来说，经济发展以粗放型的制造业与非核心的低端知识产业发展为主，自主创新并引领全球发展趋势的技术几乎还是空白。全球技术领先的跨国公司来到我国发展，进行研发、生产、人力资源的本地化战略，不但能够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革新，也有助于本土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培养。未来几十年，我国还应继续注意发挥跨国企业的作用，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与产业升级。

七、注意发挥跨国企业的作用，推动本土企业的走出去与国际化。海外跨国企业来到中国投资与发展、以及进行“当地化”的同时，是中国本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与“走出去”。我国应注意发挥跨国企业的作用推动本土企业的“国际化”与“走出去”：一方面，海外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各方面联系、交流包括人员的流动，有助于间接地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水准，包括企业管理、视野、文化、氛围、经验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海外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合作，进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以及以第三方的方式进行咨询、投资、金融、人员培训等服务，也可以直接帮助我国本土企业的“走出去”。

◆ 国际问题

对于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

澳大利亚 IPIE BANK 研究所名誉主任 郭生祥

不难预料，只要美国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美国就会再拿人民币升值说事。尽管在危机的时候，中美两国似乎互相帮助，都施行积极的救市政策，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走在美国前面。但是危机过后，把危机归结为人民币的失衡，这种声音也迟早会卷土重来，因为华尔街是现实的，好得快、忘得也快。果然，2010年美国的经济稍有复苏，美国就开始酝酿对人民币的围困策略，再次指责人民币被操纵，迫使人民币升值。

中美之间的“三道菜”

就汇率本身来说，即使当初有再多的不公平，但是只要实行了一段时间，一般2-3年，也达到了自己的生态平衡，一个习惯的叫法叫霍姆斯平衡。从1944年到1968年，应该说是美元的格里芬悖论上升时期，之后是美元格里芬悖论的下坡路时期。1970年代的美国硬把美元与黄金脱钩，换成自由浮动汇率，再巧妙地把美元与石油、黄金、粮食、高科技、主要贸易权垄断挂钩，成功地充当了世界货币40年，其间还把马克、日元、欧元逼进了死胡同。现在正是美元逼近人民币的时候了。

危机前，按照自由贸易原则，美国人大吃大喝了中国人的第一道菜，那就是沃尔玛模式，这个模式公然把中国商品要杀价到全世界最便宜的程度，几乎让中国企业没有什么利润可挣，他们的口号是为美国人购买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要知道中国人摆上桌的这道菜，在前面采购的能源、矿石、原材料、原器件、成套设备等资本设备都是最高价格买进的，进的是高价，出的却是低价。

第二道菜是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行所谓地定量宽松政策，使美元大幅度贬值，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贬值，而在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中国财政、货币投入量又是美国的多倍，那拉动的大部分需求，不是过剩，就是对外需求，美国又是最大的收益。

第三道菜，在美国经济刚有复苏迹象的时候，他们先是瞄准低碳经济，再是瞄准恢复自己的制造业，二者的目标都是把矛头对准人民币，强迫其汇率

升值，让其美元资产进一步贬值，这三道菜是环环相扣，真乃高明到顶的连环计，可惜的是秀水街上的人民币几无招架之功，那还有还手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谈人民币汇率的渐进性、可控性、灵活性，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

来而不往非礼也

现代市场博弈，政府、学者、立法机构、商人都参与其中，但是必须各司其责，既不能串位，也不能失责，否则不是等于干预，就是等于缺位。中美之间的市场博弈，除了政府对政府、学者对学者，还应该有人大政协对参众两院，才能罗齐鼓齐，旗鼓相当。早在2010年3月北京的两会，我当时就想提个议案，中国应该热热闹闹地提出要让美国政府为中国1.2兆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贬值保险，先发制人。

第一，如果美国提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那么我们反提美国操纵中国手里的美元资产，如果美国愿意为这些资产提供贬值担保，而且是按照美元贬值或通货膨胀率计算的话，那么就是恰当而真诚的，否则，如果美国赖账的话，那么，人民币可以对应地不升值。

第二，如果美国提出自由汇兑，那么我们可以回答重新回到一揽子货币中去。这既给足了盖特纳面子，自己也有了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迂回。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让人民币进一步市场化，市场的问题还是让市场来回答，人民币的升贬问题还是让人民币与美元交易的市场来校正。这不是美国一直所要求的市场主义吗？

第三，如果美国提逆差，但是美国对中国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出口？除了所谓的高科技，美国哪些东西是中国所需要的呢？如果美国对所谓地高科技不放开，那么中美贸易这个逆差就不单是今天的事，即使汇价提得再高，美国也没有竞争力。同时我们还可以问一问，中国制造的上游能源、原材料、元器件等资本设备都在涨价，而中间制造业产品却被“沃尔玛”们压价，这前提价，后压价，造成了中国制造的低价泛滥，到底是谁之过？现在又要人民币升值，难道人民币总是吃亏吗？

良性循环的建议

如果真要解决分歧，我的建议是，对于能源和原材料，要么仿照欧佩克模式，要么仿照欧洲煤钢联营模式，前者让最大的消费市场占有不少于20%的定价权，否则，上下、左右、中间产品的定价还会被继续扭曲，

美元和人民币的问题顶多是这个扭曲的折射；要么仿照1954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模式，只有统一为一个一体化市场，才可能消除单方供需垄断的扭曲，从而从市场的角度校正货币的扭曲，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关系才会恢复正常。

对于沃尔玛模式，采购价格不断降低，这使中国制造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中国关税不断累积、中国外汇结算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看来造成了中国顺差不断增多，但是中国企业、家庭却收入不断减少，制造企业也没得到太多红利，结果是两败俱伤。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尽管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输送给美国，但美国的华尔街如果不经营资本转手贸易，那美国既经常贸易赤字，又会资本贸易赤字，再系上财政赤字、医疗保险赤字，那么对于美国就可能只得更加雪上加霜了。这个意思是说，恶性循环的结果，其实对于美国自己也未必是利大于弊。

对于中国来说，外汇储备增加也必须与产品定价机制结合起来，也就是只有适当地反应了中国制造的正常成本、正常利润后，中国制造才不会那么扭曲价格、低价扩张，中国制造会得到合理的市场份额、合理的节约使用，从而得到较为合理的比较优势，这样既会造成合理的市场分工，还会减少中国盈余，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差不会那么大，这样就会形成相当的良性循环。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杀价恶性循环，造成资源、环境的浪费和污染。也只有双方合理定价，合理地资源配置，合理地开发与利用，中美市场分工才能更多是互利互惠、真正有意义的市场分工，形成不断的良性循环。

中国面对人民币的公关危机

加拿大知名华裔时事评价家 丁果

谁也没有料到，胡锦涛主席刚刚参加完“金砖四国”会议，转眼印度和巴西这两个中国的“金砖同伴”竟然和美国同调，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之际，强烈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一下子，中国和西方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对峙局面，发生了倾斜。

当然，印度和巴西可能并非为美国帮腔。它们显然认为人民币升值对

本国经济，或者说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有帮助。中国的愤青们固然可以大骂两国成为美国的帮凶，但我们应清楚看到，抛开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的技术性争论，在汇率问题上，中国的国际公关毫无疑问遭遇了挫折，甚至是失败。

更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的外交手段。他摒弃了前任单边的强压中国低头的霸权主义方式，而是说服新兴经济体加入来催促人民币升值。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外交手段，即联合第三世界对抗美国压力的做法，如今被奥巴马灵活地反过来运用在中国身上。来自印度、巴西的抨击，比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和冲击更重。

其实，中国的国际公关出问题，已是有迹可循；而奥巴马的柔性外交，也手段成熟，效果彰显。英国广播公司(BBC)最新一次的年度国家观感调查，得出了相当有利于美国、不利于北京的结论。在被访的28国民众中，平均46%的人认为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多于认为负面的34%。而在2007年，同样一项28国调查中，对美国持正面观感的只有28%。这份调查报告对美国是好消息，对中国则是警讯。因为28国受访者中，觉得中国对世界持正面影响的，与觉得持负面影响的大致相当。但若要以年平均数来看，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者，由5年前的49%，降低到了今年的31%。

在刚刚过去的全球核安全峰会上，奥巴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张照片，仍让人记忆犹新。在照片上，奥巴马与胡锦涛握手时明显处于鞠躬的姿态。对此，美国保守派猛烈抨击奥巴马没有格调，有的更数落奥巴马在此前会见沙乌地国王等人时，甚至出现了90度鞠躬。

保守派舆论嘲笑奥巴马腰身太软，甚至有点卑躬屈膝，有损美国世界霸主的颜面。但这个调查却显示，奥巴马深得“周恩来风范”。他稍一弯腰，换来的是美国形象的改善，这里面的得失，可谓一目了然。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执单边主义霸道横行，美国形象一落千丈。如今，美国的好感度快速回升，显示奥巴马上台后推动的“对话外交”、“明智外交”，已结出了丰硕果实，他主导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核安全峰会，也在国际上获得普遍正面反响。

问题出在中国，这几年来中国迅速崛起，国力直线上升，国际能见度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奥巴马在访华时提出了美中共管世界事务的概

念，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好感度则是走了相反的路线。这是为什么？美国、日本对中国没有好感，中国尚有理由，但当第三世界也加入对中国不满的行列时，中国不能不反省。若说人家是嫉妒心态，眼红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并没有强大到今天美国的程度，为何他人对美国的好感度却增加了呢？中国似乎应该检讨一下——是否外交上太过忽视第三世界？是否经贸合作上没有注意平等互利？是否在非洲的开发给人掠夺资源之感？是否中国的游客在各地“财大气粗”不太文明？等等。

以往的中美之争中，第三世界都倾向于站在中国一边，让中国虽弱却可以理直气壮。如今这种局面是否出现了转变？是否中国认为只要对抗美国，第三世界就是天然盟军的想法，已经过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在不断鞠躬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力量还在指责中国在外交上太软，还在要求中国有更多的“霸气”。

如今，世界对美中好感度的逆转，应当让中国正视一个选择：中国是要走美国过去的单边主义、令人生厌的老路，还是应当学习奥巴马，重视联合与吸纳，以谦卑赢得尊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领袖也要依样画葫芦，像奥巴马那样弯腰与人握手。而是说中国强大后，能够不傲慢，不做“暴发户”，不我行我素，坚持宽容理性和谐，同时又不是“自扫门前雪”，而是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否则，中国在还没有达到美国实力的时候，就可能“享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待遇”；中国还没有作老大，甚至老二，就已经面临四面攻击。

◆ 深化改革

中国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不断做大的特权利益和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必将迅速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因此，

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通过改革在制度上确保分配的公正，从而完成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势在必行。

改革的分歧与阻力

近年来，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和制度创新的努力和实践似乎不曾停顿。然而，就整体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因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分配不公而不断被激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因特权利益集团的跋扈及其对公共权力的挟持而日益受质疑。凡此种种，原因何在？

首先，在思想理论界，对改革的方向有着根本的分歧。有些主张用行政措施来掌控市场经济，用政治手段来压制特权，以此确保利益分配的平等与公正；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产生，是因为政治权力对经济毫无制约的干预所致，要求通过改革来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对决策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两类主张的不同，也表明政策改革已成为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瓶颈。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不断开放，民众公民意识日益高涨，另一方面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

改革的力量与路径

改革是以现行制度为基础，以完善现行制度为目标的改良运动。因此，在中国的改革中，执政党必须坚持自身的主导地位，维护现有体制(system)的稳定性及其治理(governance)的有效性；以立法形式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抑制特权垄断，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并积极寻求政治妥协。制度(institutions)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唯一路径，通过持续改良而完成民主化、现代化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需要重视的是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不以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为主导，而更多的是受权益的驱动。他们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已有的资产和权益不受侵犯，要求其平等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其政治要求和参与方式非常坚决持久，但绝不激进；他们会毫不退让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并不赞同暴力，愿意接受合理的妥协。

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政府改革的方向有一致性：都清醒地认识到保持社会安定是他们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由执政党主导

的、以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改革，必须坚持不断的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政治程序与社会公共政策、将公共政治事务的运作制度化。这是改革的唯一路径。

改革的内容与方式

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大致有英、美、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等六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尽管运作方式各异，所有这些成熟的民主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即公共政治事务运作程序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

1、权力制度化。其根本在于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因职设权，而绝不因人授权，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授予及其合法性，权力的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联，都是由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的，不得随意更改。

2、政策制定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政策的合法性，不在于其是否“合理”，而在于其产生是否符合既定的程序。程序不但保证了政策的透明性，而且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制衡机制”的产生。

3、政治参与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政治体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基础；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是协调和规范政治参与的必要方式。

这三个“制度化”，应该是中国通过制度创新而完成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事实上，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程序制度化已经在中国进行，这是中国改革迄今最具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政策制定制度化在中国还处在起步阶段，政治参与制度化则是目前中国目前薄弱的一环。

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努力必须集中两个关键的层面：完善人民代表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其中，建立公民社会的关键之一，是要促进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应该依法积极引导和鼓励发展有关政策研究(智库)、咨询、游说、民意调查、人权保障、文化教育等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功能的非政府组织，使其一方面为执政党提供政策咨询、协助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同时抑制和监督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泛滥。

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以完善国家制度与社会公共政策为最终目的的改革，则是执政党不可避免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应对这一挑战的理性选择，是坚持改革的主导地位、通过不断的、全面的制度创新来扼制特权、建立并保护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从而保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引领中国完成转型。

◆ 经济转型

经济结构恶化比 GDP 增长更需要重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黄亚生

很多人因为中国2009年“保八”成功而感到高兴和自信，但是，GDP反映更多的是生产和供给，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如果一个经济的GDP增长率达到20%，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只有8%的话，这也不是个值得庆祝的结果。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增长以上世纪80年代最快，其次是最近几年。1990年代是最差的。如果不是1990年底后半期通货膨胀率为负，那么，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也会是负，而当时的GDP增长仍然很快，最差的时候也在7%以上。

居民收入过去两三年有增长，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担心公布的数据是否和现实情况有差距。从统计数据上看，2007年以后农村居民收支调查中，高收入人群样本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2005年最高收入人群占调查样本的19%左右，但到了2007年占到了30%多。这种调整一部分是因为收入增长，但调整的速度在两年之内如此之快确实有“被增长”的嫌疑。中国的统计数据要辩证地去看，另一个案例是失业率的数据。如果看官方统计数据，城市失业率很多年来一直稳定在4%多一点，但是牛津大学有位经济学家把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各种数据来源重新做了一下统计，以1998年为例，官方的失业率数据是4%多，他计算的结果是13%。

中国出现这种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速的现象，一大背景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恶化，特别是采取通过发展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应对金

融危机。以房地产为例，有人说泡沫就像鬼一样，都在说，但是谁也没见过。其实，泡沫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来说的，关键看经济的基本面能否支撑泡沫。但是，如果以为泡沫不破裂就认为没有泡沫，也是很奇怪的思维方法。按照这样的观点，美国金融危机前房地产也没有泡沫。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是靠房地产的泡沫来带动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为了不出现问题就只能维持这个泡沫，维持泡沫就要靠银行信贷，但是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发生连锁效应。很难说泡沫破裂的概率有多大，但从中国的楼房售价和租赁价格比来看，出现了很严重的反差。这也能说明房价的上涨是由过多的信贷资金所催生的，而不是来自实际需求。一夜之间获得资金的成本大幅降低，这些资金就要寻找快速回报的投资渠道，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流到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市场很容易引发银行的连锁反映。目前人们对银行有信心，觉得有政府担保，即使出现问题也能通过注资解决，但即使有这样的信心他们最终还是要负担成本。因为居民要将未来的收入更多地给交给政府来弥补注资的成本。注资就会有政府赤字，弥补赤字还是要通过税收或者增发货币来弥补，这些都是公众未来要承担的成本。如果没有注资的话，这部分钱本来可以用于其它用途，用来弥补赤字的税收也可以减征。注资只是会计上的手段，坏账还在那里，只不过发生了会计转移。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在于银行有没有坏账，而是整个国家有没有坏账。美国政府给华尔街上的大银行注资，但是仅仅一年时间，他们几乎就把钱全都还上了。我们曾经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现在那部分坏账还在，只不过从银行转到了资产管理公司那里。其实，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的迹象，比如开始注重农村收入的增长，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等。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些措施还在进行，但其正面的作用会被国进民退的负面作用盖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应该加强努力，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

◆ 人才竞争

中国需谋万世与全局的人才战略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

新年之初，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会议认为，制定并实施纲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中国必须加快建立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努力建设人才强国，会议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摆在突出位置。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正因为人才建设滞后于国家发展，所以经济规模进入世界前列，核心竞争力不是依靠高新产业与知识经济，不是人才的创新与创意，而是廉价的劳动力与低端制造业，最终导致我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火车头，却并没有获得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主要利润。

然而，发展知识与高新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成为脑力战场的主要玩家，最需要的不是土地与能源，而是大量的人才。无论国家的人才培养还是人才引进，绝不只是教育或人事一个部门的事情。人才建设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只是在教育部建立留学生服务中心，在人事部建立外国专家局，以及出台局部政策与计划，或者只强调教育体系进行改革，这都并不足够。

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建立具备全球开放型、具备中长期以及整体规划的国家人才战略是重要原因：教育领域建设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排名世界前40大学美国占了一半以上），吸纳全世界优秀的青年去深造（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超过三分之一给了外国留学生），移民部门避免争取这些优秀人才获得绿卡以及入籍美国成为本土人才（例如每年美国接纳14万职业移民）；最后，政府以及社会向这些人才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例如全世界科研经费40%由美国提供）。其人才战略是全球开放型的，并深具中长期的全局规划。

孙子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我国必须建立适应全球化大趋势与自身国情的开放型大国人才战略,出台具有远见以及指导意义的国家人才建设中长期规划,把“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制度化、常态化、长期化,完善我国的人才培养、引进、选拔、使用、激励等人才机制,形成良好的人才环境与土壤,我国的人才建设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才能成为科技强国、知识强国以及世界大国。

◆ 科研改革

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的建议

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曾左韬

纵观世界近代发展史,世界超级强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的背后,是以科技研发及将这些研发的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来支撑的。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从珍妮纺织机和蒸汽机开始掀起工业革命,制造力有了千百倍的提高,才走到了最强盛时期,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后来,英国虽然在军事和金融上长期保持强势,科研上却逐渐落后,到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科技研发的停滞落后也导致大英帝国失去实质主导优势,并最终崩溃。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大力发展,迅速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国,但日本科技很大程度上是copy paste的模式,原创研发不多。这使得九十年代美国发明的互联网等高科技一出,日本传真机立刻滞销。因此,日本虽然学得很快,赶得很快,但却最终无法超越,日本经济也由于未能在新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而长期停滞。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研发上超越美国,今后可能会重蹈日本覆辙。

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139.15万人,这些人员里仍然滞留海外的人员近100余万,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国外各行业的顶尖人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30年来也大幅跃进,虽然虚拟经济成分的GDP指标上仍然落后美国,但在很多实物指标如钢铁煤和水泥产量上不仅超英,而且早已超美。并且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下一步的超越打下

了基础。

不过，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实体经济的很多总体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却差得很远，尤其是在科研原创上仍然严重不足。中国不是没有创新人才，许多中国的留学生还成为国外创新研发的主力。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创新人才很难出头。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获取科研经费乃至职位升迁，都涉及种种复杂关系，而偏偏创新性人才只要不长于关系，也包括很多长于科研的原创性人才，在中国的学术环境里就容易受到非创新文化和制度的压制而出不了头，导致中国科研很多是跟着跑的研究，学风浮躁，抄袭剽窃盛行。而缺乏引领性的原创。因此，大量海归回来，也许对中国科技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能做出卓越贡献，但未能改变国内不利于创新研发的环境风气，也不会产生重大的创新性成就。

现在有很多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十几二十年，有相当成就的海外科技精英也很难习惯国内的学术环境。他们遇到的多不是硬件设备的问题，而是决定竞争升迁、经费申请、学术争论等等行事规则和文化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整体环境问题，可以说，“去行政化”只是改善学术环境的一个主要方法，而不是全部。

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的海归科技特区，招百万海外学子回归。其实质是利用国外创新文化，建立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学术环境。因此，建议为了重建有利于创新的学术环境，中国不妨把两万亿外储拿一部分出来，在科技风气强的城市如无锡等城市，或其他有共识的地区建立海归的科技特区，形成类海外的工作环境，以类海外有利于创新研发的规则行事，作为试点，形成规模，这应当比一项科技试验对国家的意义更大。而且，经济特区能成功，为什么科技特区就不能？昨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今日科技特区成功的基础和样板。科技特区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引入了有利于这些人才发挥的能激发创新的文化和管理机制，将为今后中国能够在GDP总量接近美国后，进一步超越提供人才和制度的基础。

如何在中国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

美国伊利诺理工学院教授 孙贤和

最近我一篇关于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的文章被世界华人周刊和其他海外媒体转载，文中提出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的观点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在学界引起了一些思考和讨论。讨论与思考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在中国建立类海外的学术环境，以及例如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模式能否移植到中国？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成立于1883年，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已经变成美国主要的学术研究中心，成为美国境内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从无到有，短短几年，成功跻身世界前列，不仅推动了香港科技的发展，还带动了整个香港的教育改革。中国本土想以香港科大为样板，打造世界名校，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就筹办了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动作很大，但困难也不小。

美国德州建大学本身就没有教育体制的问题，香港科大是以美式教育体制冲击英式教育体制，由于欧美教育体制本是同根生，院校自治，尊重知识，这些大的人文环境生而有之，因此，美国和香港建立科技大学改变的只是校内的激励制度，较易成功。而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就大不相同了，首任校长朱清时提出了“去行政化”的理念，大有建类海外学术环境之势，但以中国之大，制度之不同，照搬香港科大的经验，遇到了无数难题。如何才能建立好类海外的学术环境？同仁曾佐涛博士还提出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的大概念，观点新颖，值得深思。

建类海外的学术环境在中国其实有例可循，只是现存的类海外学术环境规模不大，且往往以不同的特殊方式出现，难以推广。综合一下，中国类海外的环境大概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存在，我给他们起了名字叫：搭温室，建飞地，及脱轨运行。

近年来海归成功的例子很多都是以搭温室的形式出现的。王晓东的生命科学研究所是这样的一个温室，研究资金来自特别渠道，所里的领军人物多是国外刚刚回来或仍两边跑的科学家，基础研究人员大多是博士后，能够安心在类海外的学术环境下做研究、出成果。姚期智的清华大学理论

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是另一个温室，研究中心以清华之名可找来最好的学生，以清华基金会的基金可以聘请世界一流专家来校短期讲学，优生、大师再加上埋首理论研究是中国学生之长项，因此，研究中心硕果频出。搭温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效的也是成功的，但其有不可复制性，从这些温室里走出来的学生，博士后，一旦步入新的工作岗位，由于工作环境不能复制温室，因此在中国现实的科研环境中，他们一旦独立往往不知所措、很难适应。

建飞地也是建立类海外的学术环境的方法之一。许多跨国公司像微软，摩托罗拉都把他们的研究院建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他们的科研体制带到了中国，这些研究院办的非常出色，也培养了一些中国研究人员（据人民日报2010年3月17日报道，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个，其中以独立法人存在的外商研发中心共465家）。但一个公司的关键技术大多是商业机密，是不公开的，即使那些公开发表的部分，知识产权也是人家的，因此飞地的成功并不能带来中国知识产权的自主。澳门大学在珠海建分校可以算是建飞地的一个新的形式，十分新意，但澳门大学向来就不是一个研究型大学，这次借壳上市能否成功，还需要拭目以待。

脱轨运行有两种：一种是私人企业搞科研，一种是国家国防重点科研。高科技企业要搞大搞好，必须要有一流的技术，也就是说要有一流的科技力量。私人高科技企业要拥有自己的尖端技术，可以照搬外企文化，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利润的压力下大多走的是以现有技术或现有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之路，投资少，风险低，有路可循，但这条路走到极致，即使是从中国市场走向了世界市场，结果也就是个日本模式。

基础研究的主力还得靠国家投入，在西方国家亦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国防科技单位有类海外的科研环境，因为从管理体制来讲，它们很少有可比性，但在国防科技单位，尤其是担任国家重点项目的国防科技单位，少受政治干扰，任人唯贤的事实还是有目共睹的。两弹一星的成功是知识的积累，尊重知识，才有了钱学森一辈的大师发挥能量的机会，如果没有两弹一星的国防重任，如果文革爆发时钱教授在清华或北大做院长，其后果不得而知。

让我们以以上这三种方式来审视一下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不难看出，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不是飞地，因为它不属于任何海外跨国公司或集团。南

方科技大学也没有脱轨，它与中国其他的大学一样，受教育部的统一管理。南方科技大学与其他大学的不同之处大概只在于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希望其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样板，打造类海外的学术环境，以推动中国的教育。

科技改革，其希望之大，规模之大，早已大大超过以往搭温室的范围。而科研要引入竞争体制，就必然要走出校门。只在校园内进行改革，那么所谓的“去行政化”就难免会形式化。因此，建立类海外的学术环境，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以一校之力远远不够，需要更大范围的支持。即使是资金充足的新校，在诠释和落实这一概念的时候，也会遇到众多难题，类海外的经济特区到底是特在什么地方，也需要国家、社会积极参与讨论。

◆ 跨国企业

有关跨国企业“当地化”的建议

中国与全球化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陶庆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跨国企业已由外来经济因素演变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当地化”问题也成了热门议题。同样，跨国企业来到中国需要强调“当地化”；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之后一样可能要强化“入乡随俗”，在海外“当地化”，当然，我们也许是称之为“国际化”。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的发展，未来，必然有更多中国本土出去的跨国企业面临在海外“当地化”的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外国还是中国的跨国企业，都必然既有在全球推广的全球性的品牌形象、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也有根据当地国情“当地化”的战略与机制。这一“当地化”不只是把“Coco Cola”翻译成“可口可乐”，“联想”翻译成为“lenovo”，还包括人力资源与相应管理制度的本土化，资本运作的当地化，产品设计、制造、营销的当地化等等。从根本上说，是要能让当地政府与政策制定者、当地的公民与社会、当地的市场

与消费者，不只是对其产品、品牌、服务进行认可，还要能够实现社会与文化认同，超越人文传统、精神心理、政治意识地把这个外来企业当作“当地企业”。

如果只有产品、品牌、服务的认可是不够的，人们难免会受到政治关系、社会情绪、文化心理的支配，由此遇到突发事件就抵制外来跨国企业。例如我国民间某些“抵制日货”的呼声，就不是来自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而是来自民族情绪。同样的跨国企业遭遇抵制的故事，在“西藏骚乱”、“四川大地震捐款问题”、“奥运火炬传递”等系列事件中也一再发生。

跨国企业要实现当地社会、文化的认同，自然就要在产品与市场之外做些事情。无论对于外来跨国企业来到中国还是本土企业走出去来说，都是如此。

首先，要学会游说当地政府在政策理论与制定上，要习惯把外来跨国企业与当地私营企业“一视同仁”，强调本质上说外来跨国企业来到当地，同样纳税，同样提供就业岗位，同样提供产品与服务，同样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与当地私营企业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当然，这一问题在中国也未必尽善尽美，某些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与产业，外企其实也包括我国民营企业进入常常会有一些有形与无形的限制；而同时在强调引进外资与外企的某些城市，跨国企业也甚至可能享受到比本土私营企业更大的政策优惠。

而从跨国企业自身来说，也要超越只塑造企业与产品的品牌的限制，在企业经营之外，主动并且积极地参与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公共建设与公益事业，尤其是当地举国上下非常关注的公益事业。当然，也包括一些目前未必为媒体与舆论关注、却能改善中国公共社会、有益于中国变得日渐开放理性的事情性。不要给当地舆论与民众以“只来当地赚钱，涉及当地的公共利益就是局外人”的印象。

其次，跨国企业可以考虑赞助一些智库等社会公共机构，让其为外来跨国企业不合理的政策待遇提供研究与解放方案，向政府建言献策，甚至可以通过他们发出合理的诉求与声音，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舆论，包括间接推动当地的日渐开放与国际化。企业要面对的不只是消费者与一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长期的情绪、心理、传统等，因此，只是纯粹捐款给慈善机构、建希望小学与基础设施等，还是不够的。

其三，需要要注意的是人才的“当地化”，跨国企业的人才需要在熟

悉母国与熟悉当地之中寻找平衡。在华跨国企业相当部分高管是海归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许多高层次海归有在欧美生活学习的经历，熟悉西方规则、文化、国情，又有中国本土的人脉与根基，能够为跨国企业当地化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跨国企业内部要重视对当地人才的国际化或本土人才的当地化的培训，外部要积极为当地教育体系增加国际化的内容做有推动意义的事情，帮助培养国际化、认同自身的下一代社会公民。

◆ 港澳台研究

香港年轻人贫困化的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最近接到上海朋友传来一个网上的帖子，说的是上海年轻人的收入和择偶的关系。作者把年轻人的收入分成几等，低的在2000元以下，高的在10000元以上，进行比较说明了收入对生活选择的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想起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年轻一代的贫困化问题。

香港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当时大家以为是暂时的，等到危机过去以后，年轻人的收入还会上升，但过去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香港受到了过去金融危机的打击，2008年以后的金融海啸也受到了打击。尽管香港富翁的财富缩水率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但是富人们的财富恢复得很快。今年的一个调查显示，香港富豪的身价已经回来了，富豪财富恢复的速度，已经算作是亚洲最快。但在年轻人那里，情形完全不同，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困难一来，他们的工资下跌得很快，经济恢复了，工资上涨却轮不上他们。

香港大学本科生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生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他们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相当于在上海月薪3000多元，生活比较紧张。香港房子也很昂贵，除了极少数能够在家里住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家里住，因为父母住的

地方本来就很小，根本住不下，而单租或者合伙租一个很小的单元，一个月租金就要2000元；上下班的通勤费用，一天要50元港币，一个月要1500；手机费怎么也要两三百元；青年人总归需要一点交际，香港的伙食比伦敦、纽约要便宜，但比上海要贵。供应中饭的公司属于极少数，大部分都要到外面去掏钱吃个中餐，最便宜也要25元钱，加上饮料，需要30元钱，一个月又是一千元走掉了，这样4000多元已经没有了。剩下来的钱才能用在买衣服、早晚两顿饭和交女朋友、偶尔看电影上面，而这8000元，还是没刨掉税收的工资。

今天香港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不断有新的大学生涌进来，使他们和雇主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大大减少，涨薪的可能性就很低。香港的制造业在20年前已经陆续迁走，现在，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这个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收入非常两极分化，上层人士每个月的收入有几十万，最底层月薪只有万把块钱。香港也想引进一些其他的产业，但基本上都没有搞起来。这些年香港的GDP在增长，人均GDP也在增长，但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还是出现了持续的贫困化现象。周围的建筑一栋栋地建起来，但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越多的高楼建起，他反而觉得房地产价格越来越上去，压力就更大了。

1993年到1995年的时候，在香港还能看到大片很老的区域，里面的住房虽然不很现代化，但是价钱便宜，吃的东西很草根，但有很特别的风味。近年来，这些老城区都成片成片地被政府纳入再开发，那些旧旧的、小小的住宅区都没了，低档收入人群能够生存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个现象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扭转，我认为，这就是年轻一代贫困化的一个结构上的原因。

由于工作机会少，薪水低，工资上涨慢，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香港的年轻人很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起码的再投资。这导致了愤懑、失望和愤怒的情绪。这几个月来，香港天天在讨论80后的问题，人们发现，80后的对抗情绪和激进情绪在日益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工商业和政界人士的反应还很冷淡，从长远看，他们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年轻人的贫困将对香港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